



▲柯立夫图书馆内《蒙古秘史》藏书

▶拉铁摩尔的著作照片



◀ (上接6版)

广为传阅，颇具影响力。出于对拉铁摩尔游走中国边疆和亚洲内陆的敬慕，巴雷特慷慨解囊，答应为他往后两年的田野考察和中亚研究提供资助。

拉铁摩尔在哈佛碧波地博物馆研修的这段时间里，正值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之初，学社正联络各方汉学家前来讲学、交流。1928年到1929年间受邀来哈佛讲课的有伯希和 (Paul Pelliot)、洪业 (William Hung)、钢和泰 (Baron von Stael-Holstein) 和博晨光 (Lucius Porter)。从而拉铁摩尔有机会结识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们和受邀来讲学的领衔汉学家。哈佛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蔡斯 (George Chase) 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趁他在人类学系研修期间，邀请他做一场在中国东北旅行考察的演讲。

当时这几位重要的学者的到来为波士顿地区带来一股小小的“内陆亚洲热”，他们开始为学生开设有关亚洲的课程。1928年末，伯希和在哈佛的福格美术馆做完有关中国艺术史的讲座后，当时波士顿地区的名流卡尔·凯勒 (Carl T. Keller) 邀请他和十八位客人赴宴，其中就有拉铁摩尔和钢和泰。晚宴后，凯勒写信给远在英国牛津的斯坦因，兴致勃勃地介绍正在哈佛的同道拉铁摩尔以及他的中亚探险之旅。斯坦因回应道：“我曾在《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中亚研究学会》上读到他的文章。拉铁摩尔夫妇历经千辛万苦在新疆重聚的历险，的确充满了勇气、胆量和远征的能耐。”

来 哈佛研修的经历不仅为拉铁摩尔提供了和学界交流他的游历和著作的机会，而且成为他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源起。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所言：“我们需

要继续研究、学习更多的东西。回到美国后，得助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支持，我们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了八个月的研究。之后，在1929年，进一步得到美国地理学会的支持——写作这本书的酝酿由此开始——我们又到中国满洲。”(唐晓峰译文)

当时任职哈佛福格美术馆的华尔纳 (Langdon Warner) 向拉铁摩尔夫妇介绍了日本和他的日本友人。1929年8月，拉铁摩尔夫妇启程回亚洲，中途停靠日本两周，经华尔纳介绍，走访京都和东京多处。10月4日，他启程回到中国，途中给华尔纳的信中坦率直言：“即将返华，不管回去后的经历充满乐趣还是令人失望，我都深深为之兴奋。”即将开始的前往东北的实地研究也是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资助的，但是经费不足，而他在哈佛时通过迪克森介绍认识的巴雷特为他提供了额外的资助。可以说，在哈佛的八个月，拉铁摩尔成果颇丰，不虚此行。

当时他已经出版了《东北文明的摇篮》，而《高地鞑靼》即将面世。除了《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中亚研究学会》上发表的论文之外，他还在《亚洲》《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另外，他回北京时又见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位董事伍兹 (James Woods) 和钢和泰。当时伍兹在中国访问教会大学，为刚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招兵买马，而钢和泰在哈佛任教一年之后刚回北京，继续接管汉印研究所 (Sino-Indian Institute)。在他们的鼓励下，11月2日，他从穆克屯 (沈阳) 向哈佛燕京学社发出了研究经费申请书，计划在1930—1931年度前往北京，在那里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并到中国边疆考察。拉铁摩尔在申请书后一下罗列了七位推荐人，其中有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哈佛人类学系的艾

尔弗雷德·托泽 (Alfred M. Tozzer)、人类学系的罗兰·迪克森，还有美国地理学会主席以赛亚·鲍曼、精通多种亚洲语言的人类学家和史地学家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钢和泰，以及老友华尔纳，还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亚瑟·欣克斯 (Arthur Hinks)，阵容实在浩大。

在1930年3月中的董事会上，哈佛燕京学社批准了拉铁摩尔的研究经费申请书，同时得到学社资助的还有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他将来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硕士学位。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自序中写道：“(研究中国边疆的基础是如此)可是，其中还有许多准备工作。第一是学中文。因为我虽然会说中国话，我却不知道这些充满着历史的中国人民的传说究竟有没有官书的根据，此外我还想学蒙文，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在蒙古的旅行是完全由中国的商人和士兵作伴的。1930年，我们从东北到北平去，在那儿住了好几年。

▶1929年4月23日斯坦因给凯勒的回信

▶时任哈佛福格美术馆的华尔纳是拉铁摩尔的老友，两人经常书信往来

最初是由哈佛燕京学社给我一个研究员的名额……。”

1929年拉铁摩尔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经费的同时，也向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提出了申请。虽然他觉得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宗旨更符合，但他还是同时向古根海姆递交申请。他同时得到了两方的资助，而燕京学社的资助不能再续第二年，于是他决定推迟接受后者的资助时段，从1931至1933年，他在中国边疆的研究和写作是由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资助的。

1928年到1933年，完成了五年的研究后，拉铁摩尔再次回到美国，先后任职于太平洋国际学会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 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34年到1938年这一段时间是他最有成就的时候，而这些学术成果和他之前五年在北平和中国内陆边疆的考察研究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这也为他往后在巴尔的摩的霍普金斯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他潜心十年著述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出版。汉译本1941年在重庆初版，1946年在上海出了“在沪一版”。这本书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时至今日，研究内亚的学者依然在讨论拉铁摩尔书中的论点，正如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濮培德 (Peter C. Perdue) 评议的：“和同时代的亚洲学学者相比，拉铁摩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的研究跨越国界以探求中国以及内陆亚洲的地理政治结构。直至今日，学者依然立足

于他的洞见来加深对这一领域的探究。”

自1929年离开哈佛到中国东北后，拉铁摩尔多次在蒙古大漠作田野考察，辗转世界各地，大多时间生活在国外。哈佛大学碧波地博物馆的同仁并没有忘记拉铁摩尔在蒙古学方面的专长，不时向他咨询相关的考古所获。经过1950年代麦卡锡的风波后，拉铁摩尔夫妇移居英国，在利兹大学度过了七年 (1963—1970)。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纽曼 (Robert P. Newman)，这是拉铁摩尔动荡的生活中最安宁快乐的一段时光，也是他学术生涯的黄金岁月。期间，他为利兹大学创办了英国大学内的第一家中国研究中心，不时和朋友们分享他离开美国后的欢快心情：“埃莉诺和我好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这边总有很多好玩的事儿，也有很多有趣的人和我们来往。奇怪得很，巴尔的摩似乎倒像是一个死寂的英国乡村，啥新鲜事儿都没有，而我反倒觉得利兹是一座地道的美国城市，充满着内在的能量和创造力，人们总是敢想敢做。”这与其道出了利兹和巴尔的摩这两座英美城市的差别，还不如说，麦卡锡年代的经历给他留下一种观看世界的独特心态。到了1980年代，拉铁摩尔辗转世界多处之后再次回到了英国。那时他年岁已高，却孤身卜居剑桥。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的生活已不能自理。他的儿子大卫 (David Lattimore) 任教于罗德岛的布朗大学，亲自把父亲接回新英格兰。为了能就近照顾父亲，就把父亲安顿在布朗大学附近的波塔基特的寓所，离家仅两条街之隔。

拉铁摩尔去世三年后，纽曼的巨著《欧文·拉铁摩尔与美国何以“败走”中国》问世。可是前不久我才得以仔细阅读这一传记。适值新英格兰的隆冬，天寒地冻，我驱车送孩子到罗德岛州波塔基特 (Pawtucket, Rhode Island) 的一家画室参加活动，而我自己随即钻进街边的一家咖啡店坐下，接着读完此书。最后一章写的便是拉铁摩尔从英国剑桥移居新英格兰安度晚年的日子。从二十五岁开始，拉铁摩尔开始穿越亚洲内陆的高原、沙漠和戈壁险滩，游走世界多处，而在暮年，他回到了新英格兰。正是眼前这座宁静的大西洋岸的海湾小城，为这位“行万里路”的游牧学者，留下最后一处安身歇息之所。

(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